

全球化下「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裂解 與「土地無意識」^{*}

蔡志彥^{**}

摘要

台灣現代文學若從 1920 年算起，至今已達百年。多重殖民移民歷史脈絡，讓佔去大半百年路段的台灣鄉土文學，曾發展出一種從「鄉土」到「本土」，再到「台灣民族」意識的關聯。本土化論者賦予台灣文學「民族」性格，企圖塑造它成「台灣民族」的文學傳統。

然近年來經全球化及西方理論介入的台灣後殖民論述，曾動搖本土概念。「台灣民族」文學論述已經難以解釋，百年台灣文學混雜意識之異質性悖論。有感於此，本文依廖朝陽〈再談空白主體〉提出「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並參考邱貴芬台灣文學「台灣性」，援引詹明信的《政治無意識》，提出「土地無意識」的文學批評論述，盼與學界共思。期待「土地無意識」能踏讀文本，獲得更繽紛「彼時、多方、此地」語義豐富性。本文以偏向文學外部的綱領式論述行文，較難兼顧文本分析，亦無意鋪敘比較文學史，主要的用意僅在商討文學研究的某種可能性。

關鍵字：「台灣民族」文學論述、土地共同感、界義、土地無意識、視域

^{*} 「土地無意識」原初發想來自於林淑慧、林芳玫與汪俊彥教授的課堂啟發，本文並曾於幾次會議與審稿程序中，受到多位審查人提供切要的指教與意見，謹致謝忱。惟修改後之論述尚有許多未盡充分之處，則理當由本人擔負文責。

^{**} 蔡志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The Cracking of Taiwanese National Literary Theory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Land Unconscious”

Tsai Chih Yen***

Abstract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100 years if dated back to 1920.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rought by multiple colonial periods and immigrants has made Taiwan nativist literature, which occupi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development period, develop a correlation generated from nativist literature to locality in Taiwan, and then the correlation was linked to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cholars who support the Taiwanese localization movement attach national character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an attempt to shape it into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Taiwanese nation”. However,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Taiw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western theo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cause many people to waver in the concept of locality. The Taiwanese literary tradition of 100 years mixed with the paradox of heterogeneity in consciousness is now difficult to explained by the Taiwanese National Literary Theory. Upon observing this phenomenon, the literary boundary concept of the “sense of land commonality” was suggested in the study based on *More on the Subject as Void* by Chao-Yang Liao. The concepts of “Taiwanesenes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proposed by Kuei-Fen Chiu and *Political Unconscious* by Fredric Jameson were both referred,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discourse on “land unconscious” was rais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oncept of “land unconscious” can be applied to the reading of tex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emantic variety of “then, multi-party and here”. Due to the length limit, no further description or comparison of events in literary history was in the study, and the main idea of it was to discuss a possibility in literary studies.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Key words: Taiwanese national literary theory, sense of land commonality, literary boundary concept, land unconscious, perspective

甚至只有當極權主義成為陳跡時，我們這時代的真正困境才會顯現其真正形式——儘管不一定是最殘酷的形式。

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前言：全球化下台灣文學「主體性」悖論

本文企圖透過文學的論述而將「土地」再政治化，並盼藉此能讓攸關文學的各種行動表達與選擇更加貼近各處「土地」。本文觀點，在身體移動與資訊傳遞大加速的現代性世界，應可適用於世界各地文學。然，因個人學力所限，本文僅以台灣文學脈絡而論，但盼藉此拋磚引玉，能讓「文學」與「土地」的連結更相照應緊密。

每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總離不開「土地」。「土地」不只是「風景」，更不只是觀景窗裡遠遠端詳的「地理」。不同「土地」各具相異驅動能力，每當身處不同「土地」常會自然而生不同想像。所以文學決不單只是由人所創造，亦是各自「被」不同「土地」所共同成就之作品。土地看似不具生命，實際上卻極具能動性，土地總承載連串不曾停歇的連鎖事件與聯結關係。土地的形成涉及繁雜水文與生物活動，透過風化、沉積、沖蝕、混合及微生物穿透孔隙等長期運作方可成土成壤。而後「土地」承載各式「意識形態」，隨時間推移，如土壤各層間變化，在不同比重積累中相互覆蓋而成新的「意識漸層」，透過力學般的權力運作，持續相互影響著意識的構成。

每當某處「土地」上的人們仍舊在談「人與土地的關係」，其實隱示人與「土地」依然相當疏離。本文除盼讓文學價值彰顯於「土地」，也盼可回應「台灣文學」近四十年來受跨國流動所形成的內在混雜異質性悖論¹；並將針對本文所謂「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連續性斷裂，提出「土地無意識」文學批評理念作為一扇試探性對話視窗，盼與學界共思。

（一）移工現象，怎讓本土變了質？

依 2015 年的內政部統計，台灣外裔、外籍配偶人數已有近 50 萬人，並另有近 20 萬新移民子女就讀於台灣中小學校。而受資本主義與跨國分工影響，台灣外籍移工已近 56 萬人。²累算前者總計已破百萬！台北市勞工局曾與勞工運動者共同推動「台北，請聽我

¹ 林芳玫透過施叔青描述從清嘉慶到日治與戰後（時間性）的「台灣三部曲」點出，受跨國流動（空間性）的影響，關於「台灣」的想像，實已形成某種沒有定論、反對二元對立的時空混雜性。參林芳玫，《永遠在他方》（台北：開學文化，2017.12），頁 16-24。

² 內政部戶政司「主題資訊：人口政策及統計資料」，<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4>，瀏覽日期：2022.02.10。

說！」外勞詩文比賽，自 2001 年起已連續舉辦 10 多屆。而專供東南亞裔閱讀的《四方報》（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尼）創辦人張正，他於 2014 年至 2018 年間亦曾連續舉辦五屆強調先以母語寫作，而後翻譯成中文進行評審的「移民工文學獎」。³

若暫不論「移民工文學獎」翻譯程度與作品好壞的文學問題，面對已超過原住民總數的近 56 萬外籍移工，相較近年來原住民文學頗受文壇重視的蓬勃發展，及政府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同時⁴，關心文學未來發展的我們，應如何看待台灣「土地」上，離鄉者面對離鄉現實矛盾，而將內心想像時空投射而創作的這種「異鄉」文學？

（二）「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連續性斷裂

鄉土文學評論集《泥土的香味》作者彭瑞金曾舉鄉土派作家如：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大河小說為佐證，點出該時期文學創作時間設定都以乙未日軍據台為上限。彭瑞金認為該時期鄉土作家集體意識（或無意識），正是將 1895 年認定為團結抵抗的台灣民族意識起點。⁵蕭阿勤曾以王甫昌以「族群」為核心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談「台灣民族文學」概念：「隨八零年代下半台灣民族主義政治活動快速發展，原先對台灣文學特殊性的持續關懷，明顯轉變為建立『台灣民族文學』企圖」。⁶

若將蕭阿勤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集體記憶建構觀察⁷，與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⁸對照將不難發現，自 1920 年代日治時期的新文學運動至 1987 年解嚴前台灣文學發展脈絡，已經逐漸形成本土化與「台灣民族」文學論述之關連。台灣文學受到本土論者敘述出民族性格，最終目的正是將它塑成獨特「台灣民族」文學傳統。而本文的提問是，時至今日，若再以「台灣民族」文學論述解釋台灣「土地」上的文學開展，是否依舊足夠？

³ 張正，〈移民／移工文學，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文學館通訊》55（2017.06），頁 6。

⁴ 依行政院 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布新南向政策施政成果，其具體工作計畫在為台灣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全面發展，找到新方向動能 <https://www.ey.gov.tw/achievement/4FA9200AE4958785>，瀏覽日期：2022.02.10。

⁵ 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國家認同學術研究會」會議論文《台灣文學探索》（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05），頁 71。至於此處所謂將 1895 年認定為台灣民族意識起點的大河小說之文本根據，意指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李喬《寒夜三部曲》：《寒夜》、《荒村》、《孤燈》，以及東方白的《浪淘沙》。

⁶ 從蕭阿勤關於戰後民族主義的研究可以得知，那股 1970 年代知識分子面對台灣所面臨到的國際震盪局勢之省思，深深影響 1980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將視角拉回眼前台灣「土地」的轉變。參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10.05），頁 242-262。

⁷ 簡言之，蕭阿勤藉由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與「關於 1970 年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之間的密切關係，說明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的互相建構、互相形塑、互相限制與互相辯證。參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2012.12），頁 47-48、頁 158。

⁸ 彭甚至直言推動台灣文學本土化的目的，就是建構台灣民族文學。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03），頁 3-21。

1862 年～1864 年大清帝國開放淡水、基隆和打狗商港⁹，直到 1895 年的甲午戰爭期間，曾經出現大批外國人來到台灣且留下許多書寫自然作品。外語背景盧莉茹教授曾撰文¹⁰指出，該時期的斯文豪（Robert Swinhoe）和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筆下的打狗，實乃後世打狗自然書寫或地景書寫先驅。姑且不論「先驅」兩字是否精準，畢竟過往外語系養成並不需具備台灣文史內容，未能考察清代採礦探險家郁永河《裨海紀遊》¹¹相關文獻、清代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¹²，以及清代台灣方志與打狗或鳳山的關係是能理解的。但斯文豪和史蒂瑞筆下打狗自然文學作品，曾被某程度放進打狗文學脈絡應是確定的。

再舉日治台灣書寫自然的文本為例。日治期間，日本人受台灣山林吸引，踏查後曾留下許多紀行著作，如：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等皆為此例。試問，前述歐美日著作可否放在「台灣民族」文學的脈絡呢？或許紀行著作的文學性不足，因此不需討論此類問題，我們可改為觀察同時期另位日籍作家青木繁的非紀行著作作品。青木繁從 1927 年在《台灣日日新報》連載「林想漫筆」專欄開始，留下約 120 篇隨筆表達對台灣山林的想法。青木繁與其他日本作家有別之處在於，他的隨筆創作除專業科學知識外，文學素養實也占有相當部分。他在〈台灣山旅斷想〉、〈垂直地行走台灣〉說：台灣以令人感謝的「山之姿態」存在著這點，的確值得肯定。然而大部分島民都住在平地，沒有進行垂直式旅行，那是不明瞭「垂直台灣」真正價值。¹³

本文認為，青木繁倡導以山的旅行、垂直地體驗，來認知台灣的看法相當先進，台灣政府可說是遲至 2000 年才開始注重登山與開放山林戶外教育。或者我們把青木繁作品與佐藤春夫殖民地文學脈絡那篇關於台南府城奇幻短篇愛情小說〈女誠扇綺譚〉¹⁴，或是日本灣生所創作描述蘊育其成長的祖國台灣回憶錄作品¹⁵，及重要的古典文學散文郁永河《裨海紀遊》與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與清代台灣方志或八景詩等類型文本，而與台灣文學

⁹ 鄭德慶主編，《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12），頁 10。

¹⁰ 此處打狗自然書寫與歐美人之關係主參盧莉茹，〈風土自然與環境再現：十九世紀中葉兩位英美旅者筆下的打狗見聞〉，《高醫通識教育學報》11（2016.12），頁 101-125。而該世紀歐美人探訪台灣，亦可參《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¹¹ 此指《裨海紀遊》關於打狗仔港、鳳山縣之描述。亦可參郁永河原著，楊蘇之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卷上〉（台北：圓神出版社，2004）。或可參林淑慧的南台灣風土書寫研究成果〈台灣清治前期旅遊書寫的文化義蘊〉，《中國學術年刊》27（2005.03），頁 245-280。

¹² 此指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參考鳳山縣令楊毓健的參與調查資料及對打狗港相關描述。在林淑慧〈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的人文關懷探析〉對黃叔璥與《台海使槎錄》的研究亦可看出在黃叔璥與平埔族互動中，早已留下對鳳山縣許多地景觀與人文關懷紀錄。

¹³ 關於青木繁作品，趙偵宇已有極佳論述。趙偵宇，〈青木繁的台灣山林隨筆〉，《觀念、分類與文類源流》（台北：秀威資訊，2016），頁 124-149。

¹⁴ 佐藤春夫著，〈女誠扇綺譚〉，《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台灣》（台北：紅通通文化，2016），頁 41-128。其他殖民地文學作品亦可參王德威、黃英哲著，《華麗島的冒險》（台北：麥田出版，2010）。

¹⁵ 意指講述伶子出生於對她來說現已成異國的台灣，在日本戰敗後所寫人生回憶錄。鈴木伶子著，《南風如歌》（台北：蔚藍文化，2014）。

的發展脈絡¹⁶一起思考時，這些作品是否能夠透過「台灣民族」文學論述，進而讓它們進入台灣文學理性層次思考呢？

台灣新文學旅程若從 1920 年算起，至今已長達百年。台灣文學獨特的歷史脈絡，尚有持續深掘的過去歷史（例如：台灣古典文學、西拉雅族傳說、荷蘭傳教文獻），及歷史的未來尚待學界文藝界共同思考應如何全面解釋。除前述台灣文學特殊「世界樣貌」，尚有原住民、新移民、後遺民¹⁷、跨國移工等文學主體尚需釐清。事實上，在不遠未來，台灣恐還需要面對現已日漸增多的旅外作家，或離鄉移居至世界各地的台灣學人所創異鄉異地文學出現之可能；甚或面對網路科技全面佔領及移動加速的生活型態，新興傳播媒介或外國人作家（例如：Stephan Thome 於 2021 年以德文創作，目前尚未有中文版的《Pflaumenregen》¹⁸）創作關於台灣「土地」的文學出現，也會是課題。

二、「土地共同感」的文學「界義」與「土地無意識」

馬克思主義曾對解嚴後的台灣學界有過衝擊，原是屬於官方批判且禁止的論述，卻在 1980 年代末期出現年輕學子爭相了解的情形。自前述「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連續性斷裂與移工文學現象相信不難發現，個人或主體實極難獨立於其身處「土地」的社會條件與關係，而馬克思主義思想，正是屬於特別強調社會條件關係乃是個人心靈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理念。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此觀點也可檢視台灣 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為何後來逐漸轉為伏流，只因那時現代主義文學題材與當時未達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異化的台灣並不符合，與讀者逐漸產生距離。同時期自美國引入的新批評後來亦漸沒落，筆者認為同樣也是因為新批評亦較不關注作者、讀者，也較不關注文本外部社會環境，是只強調細看文本而遠離台灣現實的文學批評。也因此，關注寫實批判、社會現實面與貧富階級問題的鄉土文學，在當時自然隱隱而生。

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強調以唯物論與歷史分析，進行探討文學意識形態，是試圖以經濟、生產方式、階級差異等物質性概念來解釋歷史的路線。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及

¹⁶ 本段若輔以黃得時對抗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的台灣文學範疇界定來看時，應有助理解本段之意。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指出《裨海紀遊》、《台海使槎錄》正是台灣風土重要著作。本文雖無意比擬「台灣文學史」，但可於此先行表明，「土地無意識」並不滿足於黃得時為對抗島田而以作者出身或居留台灣的文學活動與否，從而界定台灣文學範疇的觀點。本文乃持「文本中心」的立場，企圖強調依據「文本」中的「土地」而論述文學的「主體性」問題。

¹⁷ 此指王德威後遺民論述。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2007.11），頁 23-70。

¹⁸ 這篇暫時翻譯為《梅雨》的小說，是由出生於德國且曾獲多項德國文學類大獎的 Stephan Thome（施益堅），用德文所創作攸關台灣「土地」的文學作品。試問這類作品能否透過「台灣民族」文學論述，進而讓它們進入台灣文學的理性層次思考呢？關於《Pflaumenregen》相關資訊，詳參：<https://www.perlentaucher.de/buch/stephan-thome/pflaumenregen.html>，瀏覽日期：2022.02.10。

實踐原則的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他於 1981 年所發表的《政治無意識》深刻點出，無意識的政治理念常可顯見於作家文學中；當民眾遭遇生活矛盾而備受壓抑，企圖突破的想望，總會以其他方式呈現，而文學創作正是一種象徵式表達，是作家感受自身個體或集體無意識願望之具體行動。詹明信《政治無意識》極力使文本向歷史趨勢開放，透過符碼轉換及其獨特文本分析方式，企圖調和個人主體和集體歷史變生的、明顯無法比較，卻又同時必須歷時與共時之要求。¹⁹

《政治無意識》篇首強調的歷史化主張，意指詮釋是種揭幕過程。而文學批評就是將文本中被遮蔽的歷史揭開，詹明信並稱政治視角的構成，正是一切閱讀詮釋的絕對視域。雖然《政治無意識》多處皆蘊含文學史的談論，但是對詹明信來說，「傳統文學史論述」其實是種令人懷疑的「再現性敘事現實主義子集」，《政治無意識》實更接近某種現實的敘事主義（強調應回到各文本的自身為詮釋中心）立場。²⁰回望台灣「歷史／社會」發展脈絡，極具物質性的「土地」認同在台灣文學主體建構過程中常可尋獲。本文認為，台灣作家觀察多重殖民社會所見之現實矛盾，備受壓抑卻依舊企圖解決的願望，總持續透過創作，婉轉展現於作品。因此筆者思考，《政治無意識》的文學批評理念應可嘗試用來詮釋台灣文學。

解嚴後 1990 年代「後學」林立，後現代、後殖民論述成為顯學。當時那段以外文學者為主之後殖民理論辯論，可說是繼王文興與白先勇於 1960 年代引介現代主義文學來台後，外文學界再次介入本土文化的論戰。當時學界論辯文章之多，足可稱為知識界論戰黃金時期。²¹本文在此將引述當時廖朝陽回應邱貴芬與陳昭瑛的「再談空白主體」相關文章²²，及邱貴芬尋找台灣文學台灣性論述，藉以說明本文所欲論述的「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與「土地無意識」。

（一）「土地共同感」的文學「界義」

本段將先闡述廖朝陽「空白主體」概念的精闢之處，以及其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某種不足。而後則將以深具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具體物質性「土地」視域思考「空白主體」的不足處，進而論述出「土地無意識」所謂「土地共同感」的「空白主體」觀點。

¹⁹ 在詹明信眼中，對文本採取闡釋行動之前，勢必需要對特定文本情性的已知事物和素材，進行豐富語意的擴大，及通過三個同心框架觀來拓寬文本所標誌的社會意義基礎後，方可進行文本「政治性」的闡釋，那三個框架觀分別為「政治歷史觀」、「社會觀」與「歷史觀」。詳參：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著，王逢振、陳永國譯，〈一、論闡釋：文學是社會的象徵性行為〉，《政治無意識》（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05），頁 53-54。

²⁰ 同前註，頁 1、〈前言〉，頁 1-4。

²¹ 此指學者於 1995 年 2 月至 1996 年 10 月，在《中外文學》針對後殖民理論與台灣國族論述的 18 篇互動論文。

²² 在本文論述脈絡中，廖朝陽「再談空白主體」相關文章主要包括：〈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1995.03），頁 102-126；以及〈再談空白主體〉，《中外文學》23.12（1995.05），頁 104-109。

1、「空白主體」的概念及其不足之處

廖朝陽〈再談空白主體〉是以紀傑克（Slavoj Zizek）及拉岡（Jacque Lacan）為基礎的精神分析論述，是必先預設的存有。其內涵可概述為：第一，主體須以自主與自律的自由為基礎；但此自由不能授以實質內容，因有內容將表示自由在特殊層次會受到具體條件限制。第二，「空白」並非虛無，主體「空白」亦非代表主體死亡。自由雖超越實質內容，但卻必須依附於有具體內容的實體秩序，方可進入理性層次，進而發展創造之可能。因此「空白主體」於內在自觀上具絕對性，對客體卻不能形成絕對命令，反而必須不斷藉由移入客體來調整內外關係，方可在具體歷史經驗中維持「空白」效力。²³

廖朝陽以主體自由性用來為不同歷史階段台灣人轉化的認同做註解，筆者完全同意其必須藉由不斷移入客體，調整內外關係，方可在具體歷史中維持「空白」效力的觀點。然時至今日，筆者不禁思索，現在已經超過原住民總數近 56 萬並無與台灣人經歷共同歷史經驗的外籍移工，該如何適用「空白主體」說？眾多獨立存在的離鄉者實體所能依附具體內容的實體秩序，又該是什麼？面對離鄉的現實矛盾，而將心中所願投射創作的異鄉文學，如何才能進入台灣文學理性層次思考？循此深思，「空白主體」是否已不足解釋資本主義與全球化跨國分工的台灣集體認同？莫非這群離鄉者之於台灣，就僅有依附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

2、「本『土』」與「在『地』」的「土地共同感」

如同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所提問，殖民結構的「本土」文化實質內涵究竟是什？首先必須面對後殖民論述橫向移植隱含的殖民架構，挪用過程本身就牽涉些問題。但若先僅回到台灣文學來看，廖朝陽的〈再談空白主體〉論所強調的主體不穩定性，主體內容自由移出、移入的說法，勢必得更加具體，方可因應多重移民、殖民現代性及全球化影響下的台灣文學主體論。而具體的物質性「土地」，因同時具有「本『土』」與「在『地』」意涵，並且深具馬克思強調的經濟、生產、階級等物質性特性，因而幫助了筆者嘗試思考一種因地制宜的「土地視域」，一種「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

無意識的物質性「土地」，若作為文學解釋主體，並無應當如何寫的實質內容。「土地」具有「空白」效力，且此「空白」並非虛無。「土地」在自觀層次具絕對性，對文本創作者卻不能形成是否必須寫入「土地」的絕對命令，而是任由自由（自主、自律）的創作主

²³ 同前註。關於廖朝陽回應邱貴芬與陳昭瑛論點，亦可參游勝冠〈國家認同與九零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11，頁 477-504。關於〈再談空白主體〉之論述；游文點出廖朝陽認為陳昭瑛未能抓住「現實條件的變化及個人行動與意志的選擇」這前提，是本文採納的重要觀點。簡言之，本文認為，作者寫不寫入「土地」，從來都不是被動的。

體發展創造的可能，亦可繼續在具體歷史經驗裡維持可供移入、移出的「空白」效力。有感於此，筆者參考廖朝陽的〈再談空白主體〉精神，考察台灣文學發展脈絡，提出一種不涉及認同、民族、血緣、性別、身分、語言、寫作風格、傳播媒介、文學形式、新舊流派，以及在何地創作的「空白主體」觀，筆者將其稱之為「土地共同感」的文學「界義」。此「界義」訴求，舉凡世界上曾關心或貼近台灣「土地」的文本，皆可納入台灣文學範疇，是企圖收集對台灣「土地」共同感受的文學作品歸納，也是以「台灣土地做為方法」²⁴的觀點。如此一來，前述特殊「世界樣貌」文學都將可納入台灣文學之中。但，納入後呢？

范銘如曾於〈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介紹沿襲鄉土小說寫實與現代主義敘述形式之作家作品。隨時間流變，范銘如繼續觀察 1980、1990 年代文學刊物與全國性地方文學獎，提出以「後鄉土文學」一詞²⁵，透過「寫實性模糊」、「地方性加強」、「多元文化」與「生態意識」等四種鄉土文學新內涵，為這類新一代小說品種進行定義。承前所述，筆者在此繼續自我追問，所謂「土地共同感」的文學「界義」，除了以「台灣土地做為方法」將前述「世界樣貌」文學納入台灣文學範疇外，可否解釋范銘如所謂「輕・鄉土小說」、「後鄉土文學」等台灣文學多樣內涵的女性、同志、情慾、家庭與婚姻或自然書寫豐富語義？

（二）台灣文學「台灣性」與「土地無意識」

本段將先描述邱貴芬所欲尋找的台灣文學「台灣性」，並藉其指出「土地無意識」有別於邱貴芬以「相對性」的比較位置所看待台灣文學「台灣性」的詮釋，進而定義出本文所謂「土地無意識」的文學批評理念。

1、無單一固定內容的台灣文學「台灣性」

在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有著如此觀察：她認為早期的後殖民文學論述較傾向以負面的角度評估非本土的文學傳承，而且常常較不知如何處理無關殖民的創作（例如女性、同志、情慾、家庭與婚姻、自然書寫）。此外，邱貴芬為因應

²⁴ 「台灣土地做為方法」參考自李育霖〈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闖境》（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04），頁 202-210。或有論者認為，本文應該與詹明信《政治無意識》以外理論文獻多加對話（例如：收錄於張京媛所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中，論及「國族寓言」的〈多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本文未按論者建議與該文獻進行理論對話之原因，除筆者認為台灣並不完全符合第三世界的分類，及詹明信將第三世界視為研究客體所曾引起的許多質疑反對聲浪外，從李育霖〈台灣作為方法〉文中亦可得知，對第三世界文學的政治與社會面向的過度重視，恐容易忽略詹明信本身對「寓言」的重新理解。簡言之，依李育霖以「寓言」對《亞細亞的孤兒》之詮釋，小說中的旅程已是一個隱喻的空間，而胡太明正是一個移動的寓言（walking allegory）；在胡太明絕望的處境中，只要一個移動，就是一種抵抗。而「土地無意識」則盼指出，正是因為「土地」有所在，移動方可達成，「土地」實係具有某種能動性的文本生產力。

²⁵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11（2007.12），頁 21-49。

全球化發展趨勢進而探求在地化意義的存在而提出所謂的「台灣性」，是種並無單一或固定內容的概念，是種「相對性」概念。「台灣性」在不同脈絡將會展現不同面貌，端看它被策略性地放在什麼位置呈現²⁶。

台灣受西方理論介入的後殖民論述，曾動搖過本土概念。除陳光興後殖民後國家論述隱然企圖瓦解本土符號²⁷，若連同為本土派學者如邱貴芬與廖朝陽等，也會因論點歧異而必須辯論的話，我認為邱貴芬之所以提出「台灣性」，主因應是出於對本土論述穩定性受到挑戰的一種焦慮。筆者認為，邱貴芬想藉由提出「台灣性」，為本土論述的動搖，及早做出補位準備。「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的提出，事實上也同樣建立在本土論、「台灣民族」文學論述似已經無法充分解釋近四十年來，在跨國流動全球化下所形成多元混雜意識內在異質性悖論所形成的台灣文學之觀察。²⁸「土地共同感」的台灣文學並不急著要斷代分期，因為此歷史主體就是在「土地共同感」中繼續生活，並且繼續挖掘歷史迎接未來的所有的我們，是一種希冀「求同」的文學界義。但論述至此，對「土地共同感」的文學界義應該如何解釋台灣文學豐富語意，的確需要引介某種文學批評，一種有別於邱貴芬以「相對性」比較位置看待台灣文學台灣性的詮釋方法。

2、「土地無意識」的文學批評理念

《政治無意識》篇首表明：一定要歷史化。整個文學史就是詹明信所關心的批評對象，總體化的探討是他一向注重的方式。他認為文學就是所屬社會的「象徵」行為，作家創作文學就是階級潛意識或無意識「象徵式」表達。²⁹回望台灣文學歷史／社會發展脈絡，極具物質性的「土地」認同概念在多個時期都極受注目。台灣作家面對多重殖民、移民與觀察社會所感受之現實矛盾，備受壓抑卻依舊企圖嘗試解決矛盾的願望，總是持續透過創作，婉轉展現於作品。詹明信《政治無意識》的文學批評理念，正是本文將引入「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的文學批評方法。

本文認為，透過此唯物取向的「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與《政治無意識》進行之文學批評，台灣文學將不再只呈現反霸權、反壓迫、反殖民、反帝國、反封建，也能不再只依附於文化中國、日本殖民地文化的舊三角框架下滾動。那些早期後殖民文學論述較不知如何處理的無關殖民之文本，都將能被解釋被考掘。文學作品在此成為「土地」跨界擴張成就，也是作家具現化「土地」的成果。若文學的創作貼近台灣「土地」，我們都能以「政

²⁶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10），頁111-145。

²⁷ 陳光興，〈去殖民的文化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96.01），頁73-139。

²⁸ 林芳政，〈永遠在他方〉（台北：開學文化，2017），頁16-24。

²⁹ 詹明信並藉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對視覺文本如何構成「象徵性行為」而成為神話和美學的解讀，來作為「政治歷史觀如何可能生產出政治寓言」的附加說明。「文本政治寓言」的詮釋之所以可能，正是個人透過早已存在的「象徵世界」，讓「文本詮釋」與「社會／歷史／政治」間，能夠產生連結。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頁53-61。

治無意識」獨特文本分析，揭示文本賴以生成的「土地」意識，說明為何應該優先看待或不納入該種文本基質，幫助我們以文本更加了解台灣。此種「土地共同感」政治無意識文學批評，即為本文所稱「土地無意識」。

三、「土地無意識」的批評視域及其他關係

文學研究基本精神不只是追求作品原初意義，更要能創造性去研究它在不同關聯域中的涵義。³⁰因此創造性文學批評理論應當是一組相互關聯的命題，且自有一個詮釋方向。政治必定誕生於土地，「政治」意指某種「行動」意涵。從「政治無意識」到「土地無意識」的理論拼裝，本文期望能將文學批評行動取向直指「土地」，並依此形構其批評視域。

（一）「土地無意識」的視域形構

「土地無意識」並非要為「土地」灌注靈魂，而是企圖點出作家選擇哪片「土地」、如何再現「土地」，及如何受到世界各方「土地」影響。依《政治無意識》強調歷史、階級、生產方式與烏托邦的內涵，及土地的沉積、土層、墾殖、深掘特性，本文提出「四種向度」形構「土地無意識」的批評視域，並嘗試運用於文本踏讀。期望能在踏讀中將文本與其歷史和文化語境相互剖對，尋獲更多未被看見的敘事與非敘事，描述文本的意識型態和烏托邦時刻，獲得文學更繽紛「彼時、多方、此地」之語義豐富性。

本段所謂「土地無意識」的「四種向度」批評視域，可依據文學「外部」與「內部」的概念來理解。所謂文學「外部」意指關注文本的社會與政治脈絡的交互影響，至於文學「內部」的路徑則著重於文本語言或形式之分析。³¹因此「第一項視域：沉積而成的歷史語境」與「第二項視域：墾殖的文化生產方式」，將要提示「土地無意識」文學批評應關注的文學「外部」脈絡；至於「第三項視域：土層般的剖面視角」與「第四項視域：深掘烏托邦的矛盾」，則是嘗試析論「土地無意識」的文學「內部」視角。說明時，筆者將先以文例嘗試說明「土地無意識」四項綱領式視域之意涵，並將於每項視域說明末段，共同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³²做為四項視域各自分析目的之具體示範。期盼未來能透過「土

³⁰ 王瓊玲，〈文學批評與「理想的讀者」〉，《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8.3（2007.06），頁2。

³¹ 關於文學的「外部」，本文更聚焦於其中的〈文學與社會〉面向，至於文學的「內部」則主要以〈敘述的小說之本質與樣式〉而論。詳參韋勒克（René Wellek）、華倫（Austin Warren）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2019.10），頁151-182、378-405。

³²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1980.03）。

地」視域讓文本分析交疊凝聚，將「土地」納入歷史與文本的共時性和合，達至文本間所形成攸關「土地」的總體歷史政治因果關係。

1、第一項視域形構：沉積而成的歷史語境

為何身兼作家與研究者的陳芳明會說：「我是被教育來敵視父親的那個時代」、「我學會了指控，指控他們那一代穿殖民者服飾，說殖民者的語言」？³³為何台灣需要一本《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來說明日治的終戰記憶，除了舊課綱唯一強調的八年抗戰外，其實還有好多歷史？為何日本文豪佐藤春夫會創作一篇關於台南府城的奇幻短篇愛情小說〈女誠扇綺譚〉，裡頭竟還點出廈門話與泉州話差異？在日治皇民化下，王昶雄〈奔流〉所形容：「就算撞上風的稜角，也繼續更加猛力奔跑」，究竟想要表達何種矛盾認同與情感衝突？戰後本土作家若不願流為反共文學工具，將會遭遇何種困境？³⁴而在鍾理和《笠山農場》中，同姓氏戀情為何不被允許與祝福？為何父親是外省人的原住民女性作家利格拉樂，會想透過田野調查而創作〈紅嘴巴的 VuVu〉，來講述排灣族母系部落法則與圖騰表徵所曾遭受的衝擊？一隻班達島的黑鬼為何能被淪妙沂創作在〈烏鬼記〉裡，並能點出台灣與南島文化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關係？

文本與「現實」的關係為何？身處於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家，總能成就不同認識與想像，而每套文本所指涉的符碼再製與轉換，其實都已經積聚許多歷史細節在裡面。事實上，每位作者出生年代，皆已背負自該年代各自啟程的獨特歷史意義共性。「土地無意識」第一項視域形構，強調所有的文學都該被重新放回歷史脈絡，重新認識再製的文本與原初距離。土地上的人、事、時、地、物、情、理、法等歷史事件，總在歷史中逐漸沉積，而在歷史環境形成語境。文本指涉的政治歷史、社會歷史、階級鬥爭歷史、生產方式的歷史，皆該是「土地無意識」考慮的歷史關照。在此意義下，「土地無意識」邀請讀者進入一處歷史「競技場」；文本是場上主角，文本內容爭相踏讀成為一種歷史敘事的出場序列，把此時此地的現實，與彼時文本互相對照，進而從中觀賞出不同層位的烏托邦希望，尋獲文本細節所隸屬之「土地」。

「土地無意識」強調沉積而成的歷史語境，並非是為了要找出文學的某種答案，而是要透過尋獲文本的歷史細節，進而開啟文本內在關係與外緣意義的談論。在楊千鶴〈花開時節〉所描述優雅美麗的中、上階層女學生們（惠英、朱映、翠苑），從畢業到進入婚姻，有著「沿襲古風」還是「趨向新世代」的歷史獨特情緒；古風與新世代的選擇，隱含作者點出該年代特有歷史共性，也讓讀者易對文本留下記憶。而在楊千鶴創作多年後，當作家楊双子同以「花開時節」為名，寫一本穿越台灣日本時期的百合小說，除了呼應本文前段

³³ 陳芳明，〈相逢有樂町〉，《陳芳明文集4：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2008.06），頁15。

³⁴ 當時文壇非關反共文學主題投稿，結果常就是被退稿，詳見鍾肇政，〈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春秋》2.1（1989.10），頁310-327。

所謂的不同歷史時期總能成就不同認識與想像外，更讓我們發現作者除了要對楊千鶴致敬，也有要藉其作品帶領讀者回到日治時期的創作意圖與深層時代意義。「土地無意識」甚至期待藉此視域能夠提升某種「在地」視角，而說出文本中「土地」與「東亞史」或「世界史」的意義連結，秉持著「愈在地，就愈世界」的角度展演台灣。如在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男人魚」³⁵與〈海洋朝聖者〉「女人魚」的論述中，已能看見文本指涉水世界符碼之轉換，及其如何在歷史環境中形成海洋語境。李昂口中那隻〈會旅行的鬼〉在離返於鹿城行郊與唐山泉州的土地間，報仇後的冤魂，最終看見的是哪朝哪代的烏托邦彼岸？見與不見的海面《暗礁》土地，如何讓巴代寫成琉球人、宮古島人與排灣族人重層關係的隱喻？白先勇筆下吳漢魂的〈芝加哥之死〉，當以「台灣土地」視域看待文本中的離返殞落心境時，又將可詮釋出哪些攸關土地的眷戀、關懷、掙扎、企圖或排序？

而若以第一項視域：沉積而成的歷史語境，檢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彼時男性「孤兒」嚮慕「祖國」、強調「血統」所印證「父子相繼」觀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男性中心」的思維模式³⁶，正是文本創作時，「台灣土地」上所沉積而成的歷史語境。而當透過第一項視域思索《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刻意讓太明往返日本、台灣與中國大陸三處「土地」的情節安排實饒富深意，深深影響著文本中所謂「孤兒」意識的產生。而吳濁流其自身生長於日治時期並橫跨戰後陸續寫作的背景，及其創辦本土作家專屬文學雜誌《臺灣文藝》與鍾肇政共同挖掘新秀小說家的文壇脈絡，亦是「土地無意識」應先行理解專屬於吳濁流與文本的歷史沉積。

2、第二項視域形構：墾殖的文化生產方式

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對現代國家、宗教或政治的歷史皆具關鍵影響。他因應當時西方內部宗教戰爭提出，唯有創造一個類似巨獸利維坦手持寶劍與權杖形象的強大國家，才能讓基本教義派停止殘殺，真正達到重建秩序建立和平。而後「民族國家」與「國家治理」隨西發里亞合約簽署，逐漸形成全球流行的世界秩序與主權國家思潮。而台灣「土地」在歷經荷西及鄭氏王朝統治後，於康熙 23 年（1684）納入大清帝國治理版圖；直到十九世紀末，台灣「土地」因而被迫隨以儒學粉飾的法家帝國中華秩序，強行被併入類西發里亞體系世界發展歷史中。³⁷

³⁵ 「男人魚」概念可另參：夏曼·藍波安，〈男人魚〉，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2019.03），頁 103-112。

³⁶ 參梅家玲，〈性別 vs. 國家：五〇年代的台灣小說——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55（2001.11），頁 31-76。

³⁷ 此處以王飛凌書中第四章〈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中華秩序》（台北：八旗文化，2018），頁 160-164，作為本段論述文化生產背後常有統治者主導之引言，主要意指中華秩序被強行併入西發里亞體系的世界發展歷史時，台灣總被迫跟隨的被動處境。

民族國家如何「治理」文化？大清帝國如何治理其眼中的天下？大清面對東南沿海這不甚熟悉的小島，會如何思考延伸帝國統治地理念？如何邁出治理台灣這「化外之地」第一步？在清代官方主導的台灣方志〈風俗〉類中，我們看到對台灣人形象的書寫，在民風與社會現象的描述為：重利、好賭博、好鬥、好結盟、奢靡成風、迷信及不重倫理；而在人民日常生活則是好飲食檳榔、衣著奢靡華麗與好演劇的娛樂活動。³⁸這與賴和〈浪漫外紀〉裡所謂台灣人定型的性格，為何有所差異？正如吳宜蓉《帝國制式的文化鏡映》³⁹所論述方志總受到帝國固有價值觀所役使，方志作為一種帝國之眼，而與賴和作家之筆的差異，就在於帝國統治者既定文化生產模式的強行介入。

在賴和企圖提倡反封建、反迷信、反奢華習俗排場的〈鬥鬧熱〉中，我們看見一種統治者藉由縱容無知村俗順民愛看熱鬧的民風滋長，透過殖民母國的順應愚民文化施政，達成殖民政府文化治理之目的。不僅民俗活動有此現象，在當時台灣民間最為活躍的白字戲與歌仔戲，亦在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尊重舊慣」政策下，而相當程度採取放縱的態度；此舉讓將白字戲與歌仔戲視為不夠文明的本島知識分子著急不已，因為本島知識分子認為放縱白字戲與歌仔戲的演出，將會阻礙台灣邁向現代化進程。⁴⁰日治台灣作家眼中的「中央文壇」在哪裡？對日本中央文壇的憧憬，如何成為部分日語世代作家的文學志向？龍瑛宗靠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躍上中央文壇的後續發展，與周金波創作皇民文學如〈志願兵〉、〈尺的誕生〉背後，有沒有殖民政府著力的痕跡？

統治者總是不斷治理「土地」上的文化，企圖主導「土地」上的文化生產方式。戰後國民黨記取國共內戰文藝宣傳不力的失敗經驗，委由張道藩所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協會於各地成立支部大力推行的反共文學，據統計，字數竟高達數千萬字。⁴¹這種由黨政或半官方文化組織主導藝文出版界的時代，直到 1970 年代後期才開始出現非黨政背景的出版社（如：文星、遠景）。到了 1980 年代以降，中央政府與各縣市共同推動文化中心籌備興建，文建會與教育部委辦「各縣市作家作品集」座談會，及文建會影響深遠的「社區總體營造」施政規劃與地方文學獎成立等，皆有助於帶動台灣各地方文史爬梳並豐厚本土性文本內涵。⁴²統治者對於文化領域管理的墾荒投入，總是透過「治理文化」的「文化治理」統治方式運作。但「土地無意識」第二項視域形構，除了認為應當關注文化生產的統治者角色外，隨資本主義商業模式興起，認為亦當關注影響文學發展的市場機制及潛在支配生產框架為何。例如，台灣社會在 1980 年代前後，曾受文化產業與文化工業對通俗文學、純文

³⁸ 吳宜蓉，《帝國制式的文化鏡映》（台北：花木蘭文化，2013.03），頁 83-114。

³⁹ 同前註，頁 115-118。

⁴⁰ 汪俊彥，〈另一種群眾想像：日治時期的劇場〉，《台灣文學學報》22（2013.06），頁 111-151。

⁴¹ 此乃中華文獎會於五零年代僅徵集一年竟達七百萬字稿件估值，詳參張素貞，〈五十年代小說管窺〉，《文訊月刊》9（1984.03），頁 83-109；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07），頁 57-78。

⁴²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2007.12），頁 25-30。

學與學院或知識份子間之衝擊，逐漸轉變為一種消費型態影響文壇與出版的社會。⁴³當然不只資本主義曾主導文學市場發展，大河小說、歷史書寫、政治諷刺、現代主義、鄉土寫實、都會前衛、純愛禁忌、自然環保、性別關係、科幻想像、奇幻妖怪、原住民議題、後現代小說等思潮，也皆曾蔚為引領過文學生產之風潮。如同鏡照或轉身方能看到背後是誰，「土地無意識」第二項視域形構，重視文化生產的鏡映考察；因為每個文本生產背後的體制與意識形態，都是該處土地所專有的歷史產物。

而當以第二項視域：壟殖的文化生產方式，檢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彼時「官方」主導的「中國民族主義」式反共文學，正是「土地無意識」首要理解文本生產背後的統治體制。此外，當時本土作家群所面對文化生產的困境，除須面對主流反共文學的美學外，由於國民黨的語言政策所致，失語的本土作家甚至必須苦學中文才有辦法創作；於是本土作家彼時所創文本總格外具有後殖民意涵，那股受「反共文學」而斷裂的受殖遺緒，讓他們從過去歷史找出路，也因而建立戰後本土小說某種「搶救歷史」的文學現象。《亞細亞的孤兒》正是受人熟知「搶救歷史」所生產之文例。而後因冷戰結構軟化所陸續發生震撼台灣局勢的事件，間接影響文壇出現再度發掘「日治時期」的文學。文人藉引「日治時期」文學的「反抗」意識，去反「現代主義」文學過度模仿西方而不關心社會現實的狀況，亦是第二項視域應當注意的文化生產方式。

3、第三項視域形構：土層般的剖面視角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一個人掉在地上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許立志

資本家適不適合當總統？這是台灣社會曾面臨之問題。⁴⁴而工人階級許立志生前這首〈一顆螺絲掉在地上〉，雖非在台灣「土地」上創作，卻隱然可為解讀台灣「土地」是否適合讓資本家擔任總統之問答，亦可說是資本主義能跨境產生影響之例證。在馬克思主義

⁴³ 林芳政，〈雅俗之分與象徵性權力鬥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1994.03），頁55-78。

⁴⁴ 所謂台灣曾面臨資本家是否適合當總統的問題，意指跨國企業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於2019年參加國民黨黨內總統初選之事件。

文學批評脈絡的「土地無意識」第三項視域形構，強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階級」視角，相信應不讓人意外。因資本多寡與生產模式差異所產生的領導階級與勞工階級對立，及資本主義透過商品價值差異而生的階級差距，其實一直都存在台灣土地。從日治到當代，階級問題從未消失，只是以不同式樣階級瀰漫而存在，這部分若考察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亦可見一二⁴⁵。而對善於觀察社會的台灣作家來說，也早已留下許多此類作品。

早於日治時期就有賴和〈富戶人的歷史〉，透過描寫貧苦轎夫而對資產階級大富人家的批判。楊逵〈送報伕〉也曾描述勞工與農民，皆曾不分族群的遭受支配階級剝削與壓迫的社會弊病。還有王詩琅〈十字路〉裡那位對左派嗤之以鼻的張姓銀行員，他崇拜資本主義而確信自己能爬上金融業高階主管，最終卻難以對抗拆解那隱形階級結構的故事。到1970年代則有楊青矗的《工廠人》系列講述勞工階級受困於工廠領導體制的辛酸；還有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透過那位升遷無望的黃靜雄，來對跨國資本主義提出批判的故事。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萬商帝君〉中曾極度誇張崇拜跨國公司經理，最後發瘋將自己神格化，進而想像自己變成萬商帝君的林德旺，所透露出的資本主義與階級問題。然而台灣文學除了關心經濟資本下「人對人」的剝削與階級支配外，作家們還敏銳觀察到「人對自然」的「生態階級」宰制與榨取，並已開展出相當可觀的當代台灣自然書寫成果。從文獻回顧⁴⁶中能夠得知，台灣自然書寫已呈現跨領域關懷，而非僅限特定在作家寫作歷程、道德勸說、環境倫理、環境意識、科學知識的研究層次而已。

然「土地無意識」的「土層剖面視角」並非僅想提示文本「階級」層位。筆者認為，土層剖面視角所見之土層剖面概念，其所表露的視覺土壤分層（Soil Horizon），正如文本裡各種意識演出，彼此總以不明確的互動邊界糾纏著。土層間常因腐植質、堆肥或微生物混入就立即產生變化的特性，亦如文學裡轉折情節始末的急起直下，那樣具有能動性。因此，將文本剖開所見層位，不會只具階級意義，也可完全不具壓迫關係。更多時候不同厚度的土層，就如文本中角色互動或意識交流一樣，其實正彼此涵養、陷落或易位著。所以透過剖面層位分析的「土地無意識」第三項視域形構，我們考察作者創作所選層位立場，並非是為了賦予作品某種道德性考量，目的在於去剖析作者透過文本所呈現「個別層位」（個別「人物」）的內在性集體和合（文本內所有「人物」形成的某種集體內在性）與性格交織，並期望能將此漸層關係賦予更多意義，且嘗試某一種命名式的詮釋。「土地無意

⁴⁵ 在向陽〈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曾論及三零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左翼知識份子取得政治與文化運動主導權後，曾轉向具階級性的大眾文化實踐路線。此外，在1977至1978年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亦有對階級鬥爭文藝路線的爭論。

⁴⁶ 台灣當代自然書寫於1980年代才有較明顯發展。在《台灣自然寫作選》、《以書寫解放自然》〈書寫自然的歷史：台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中，對台灣自然書寫發展歷史已有完整考察。此外，各文類自然書寫成果，自1980年代後亦陸續出現於各類文選，如：《天下散文選1970~2000》、《散文教室》、《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散文卷（二）》、《台灣動物小說選》、《國民文選·散文卷》等，皆可發現逐漸增加的自然散文篇幅。不同編選觀點，不同書寫美學，卻篇篇同樣論述為台灣自然生態的動容。

識」在此所追求的並非囊括所有文本文字總和，而是文本經過更多重詮釋後，話語間如千層派般的所有關係。

刻劃戰後台灣農鄉受時代浪潮衝擊潰解所遭遇的艱苦，吳晟的三農書寫（農業、農村、農民）可說是描寫得最為全面且精準⁴⁷，當我們將其代表作品《農婦》⁴⁸剖開後可見層位，除對資本主義控訴外，還能看見「生活描寫」、「情感描寫」、「風景描寫」等不同農鄉文本詮釋層位。這對不熟悉農村文化的讀者來說，透過命名式層位的文本踏讀，應有助掌握吳晟以其同為台灣農村女性的母親為原型，所欲呈現台灣農村〈關心〉的〈耕耘與收穫〉、〈農閒時期〉〈開放式家庭〉在夏天裡的庭院熱鬧、或是在〈種植的季節〉遭遇〈下大雨的夜晚〉後，所謂做田人和天打賭〈壞收成望下季〉的〈感心〉。⁴⁹

剖開文本，找出「個別層位」的內在性集體和合，理解各種意識演出的糾纏，也可用來詮釋七等生那篇頗具爭議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我愛黑眼珠〉。首先文中李龍第、亞茲別、晴子等異國式角色命名風格（龍之等第？西洋、日式名？）之特徵，就是某一層誘人挖掘的有趣意識。由不斷透過存在主義自我辯證詰問人類生存境況的類社會邊緣人李龍第，及充滿情緒性從喜悅喚叫轉趨憤怒咒罵，最終因洪水落水的李龍第妻子晴子間，清楚顯現出兩層不同質地，卻企圖覆蓋對方的情節轉折。彷彿存在主義與現實社會之間，橫著難以跨越的洪水意識層溝，卻幫助我們掌握了黑眼珠看見的意識漸層。

而當以第三項視域：土層般的剖面視角，檢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文本中於三方「土地」移動的胡太明、彭秀才、太明的保正哥哥：志剛、到過中國的先期同學、早已抵達東京的藍、來自廣東的陳、幽香的姊夫等人物角色，以及日殖「同化」與「皇民化」時期所企圖將「台灣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正是第三項視域「土層般的剖面視角」剖開文本所見到的各種意識演出。對於「土地無意識」來說，文本裡角色互動與意識交流，實正彼此涵養、陷落或易位著。而透過第三項視域剖析作者所呈現個別「人物」的「個別層位」，亦已象徵某種內在性集體和合（文本所有「人物」形成某種集體內在性）與性格交織，「土地無意識」盼可將此漸層關係賦予更多詮釋的意義。

4、第四項視域形構：深掘烏托邦的矛盾

台灣這塊土地，曾埋葬過多少夢想？眼前這社會，絕非千家萬戶曾幻想過的社會圖像中最美好的那一個。肯定還有許多更自由、更幸福的未知可能，被化成烏托邦墨水滲進文本伏流裡，等待被讀者看見。要如何深掘？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最強形式，來自意識形態的社會階級性質與功能性概念。而在此階級概念集體辯證法下，「意識形態即是烏托邦，

⁴⁷ 宋澤萊，〈論吳晟散文的重大價值〉，《台灣新文學》6（1996.12），頁206-215。

⁴⁸ 吳晟，《農婦》（台北：洪範書店，1982.08）。

⁴⁹ 同前註，以上篇章見頁21、9、41、29、45、93、65、175。

烏托邦即是意識形態」⁵⁰，詹明信將此辯證置於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名言下進行反轉演示而說：「沒有一種文明的文獻不同時是野蠻的文獻的」⁵¹，而這同時也提示「土地無意識」的第四項視域形構，決不可缺少關注文本的烏托邦考察。但與多數追求反壓迫的烏托邦心態相悖的是，《政治無意識》揭示出階級意識產生的前個時期就是被壓迫的時期，統治階級與受其統治的階級，其實共同在內部生成某種階級團結的鏡像；統治階級與受其統治的階級，因而同時表達出各自某種集體性統一，因而不問哪種型態（統治與受其統治的階級）的所有階級意識，都同時是烏托邦的想像。⁵²

在廖炳惠眼中，烏托邦（utopia）來自希臘字根的快樂或幸運，與其相互聯結的概念還有「outopos」烏有之地（no place）。廖炳惠在此解讀烏托邦想像常和現實社會形成對照，而他認為政治無意識的被提出，是針對現狀壓抑的幸福快樂之憧憬與想像。⁵³王尚義在〈現實的邊緣〉描述主角因與父親爭執，同時陷入理智和情感、個人和家庭、自我和社會的極端矛盾中掙扎。矛與盾的意識形態衝突，讓主角自認是弱者地說出：「我是哭著到這個世界來的，但我要哭著回去」之極灰色思想。對「土地無意識」來說，不僅受壓迫者期待世界改變的欲望是種烏托邦，連「壓迫」本身，也必須進行烏托邦考察！因為唯有壓迫者與統治階級也能變形成為烏托邦的烏有之地，那麼消解「壓迫」困境方有可能實現。因此，在〈現實的邊緣〉裡，「高貴的理想」是種烏托邦，讓主角陷入極端矛盾的「可卑現實秩序」亦要成為烏有之地的烏托邦詮釋。此種詮釋是甚具積極意義的，因為消解（或重寫）霸權或統治階級的文化 and 意識形態，正是「土地無意識」第四項視域形構不同於美好世界「烏托邦」詮釋之獨特目的。

循此而以第四項視域：深掘烏托邦的矛盾，檢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不論是太明所謂「留學日本的光明啟示」⁵⁴，或是「青年人熱血希望所幻夢的中國」⁵⁵，實皆已顯露某種烏托邦的「矛盾」。而當以第四項視域繼續深掘《亞細亞的孤兒》的烏托邦追尋時，太明「在台灣『土地』上不被允許當一位台灣人，而必須被『同化』或『皇民化』實等同永遠無法成為日本人」，以及台灣人太明「在日本『土地』連承認自己是台灣人都會產生困擾，就算留學過日本也別妄想就可以成為日本人」，還有「在中國『土地』的台灣

⁵⁰ 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頁 289-290。

⁵¹ 本段為求順暢僅摘錄原出處〈歷史哲學論綱〉《本雅明文選》文字，頁 406-407。於《政治無意識》頁 285 摘錄文句尚有：「如在以前的全部歷史一樣，作為勝利者而出線的人，無論是誰，都仍然加入到今天的統治者在其受害者匍匐的身體上行進的凱旋行列。如習慣一樣，戰利品在那凱旋遊行隊伍中被舉得高高的。這些一般被稱作文化遺產」。

⁵² 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頁 292-294。

⁵³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09），頁 265。

⁵⁴ 在心儀的久子終於離太明而去後，太明突然頓覺豁然開朗起來而決定：「是的，忘記過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學，打開自己新生的扉頁……」。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 61-62。

⁵⁵ 在國民學校曾經抨擊過日籍教員的曾導師，把太明推薦到中國大陸的國立模範女子中學當教員，讓太明橫渡隔海大陸的幻夢，得以實現。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 108、112。

人太明，不被『祖國』視為中國人，而被視為敵國（日本）的人，卻也不被日本憲兵們相信太明會是自己（日本）人」等，更是清楚展現暴力化的國家機器對太明的強勢劃分，壓迫著太明對於追求理想自我的控制。烏托邦的想像性符號，已在「土地無意識」的視域下，顯露其自身裂縫與破綻矛盾。

而當烏托邦與土地連結，「土地無意識」將可重新思考鄉土的他種意涵。回到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未被討論足夠，就被王昇硬聲喊停的遺憾⁵⁶，請隨「土地無意識」思考最後這問題：「究竟戰後反共文學作家描繪童年或家鄉故事，馬華作家描寫馬來西亞再現童年鄉土，外省第二代作家創作眷村文學，是否納入台灣鄉土文學」？回望台灣歷史、政治、社會脈絡及文壇結構等多重因素看待這問題時，我們依據「土地共同感」文學界義進行踏讀：若文本創作主題貼近台灣土地者，自當可屬台灣土地鄉土文學；但若創作主題實貼近神州大陸，或貼近其童年馬來西亞土地故事，如同移民工若創作貼近其家鄉土地文本，按「土地無意識」觀點，筆者認為應賦予這些創作「類異鄉文學」命名。這樣的分類思考，是當初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權力不對等的發言位置所難以產生的看法。⁵⁷但時至解嚴世代都已年過三十的今日，如此「類異鄉文學」的分類卻應是相當自然且直觀。筆者並非「排除」其於台灣文學發展脈絡，筆者只是沒將其「納入台灣土地」⁵⁸而已。「類異鄉文學」仍是台灣文學發展過程必須給予註解的重要參照點；它落土於世界眾多地方，卻也同時出現在台灣，這將因此展現某種台灣的世界性，且透過「土地無意識」標誌「類異鄉文學」台灣性，將更能展現不同型態台灣文學歷史性。

（二）再談談文學與土地的關係

知識分類跟歸納方法，常因各時代的現代性而轉型。作家刻意自何處取材，等同透露出其有意識認定自身所擁有文化資源。「土地無意識」認為文學作品當以「土地」視之，藉以形塑文學概念及文學典律。筆者認為，當以此理念看待台灣文學之筆，漢人作家也可創作原住民文學；掙扎於種族與女性主義議題的原民女作家，也能創作無關族群受迫的都會文學；新移民作家也可創作台灣移民文學；若有台灣學子離鄉負笈世界也可創作各地異鄉文學；日本人於何時何地創作有關台灣土地的文字作品皆可納入台灣文學；未來恐將繼

⁵⁶ 王昇硬聲喊停意指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後期，國軍 67 年度文藝大會閉幕上，官方為團結文藝界而呼籲停止攻擊。本文認為，若從知識／權力角度檢視論戰過程，及論戰「結束」乃由官方呼籲停止攻擊鄉土文學而停止，更顯現出雙方發言權力位置的極不對等。

⁵⁷ 此處點出「權力不對等的發言位置」，亦是呼應廖朝陽認為陳昭瑛未能抓住「現實條件的變化」這前提之論點，參註 23。

⁵⁸ 循此再思，姜貴描寫共產黨在大陸「土地」流竄創造烏托邦假象的《旋風》，以及張貴興描寫婆羅洲砂拉越戰爭殺戮的《野豬渡河》裡，山東城鎮與豬芭村的「土地」是否可納入台灣「土地」？而若繼續循此追問曾獲台灣許多文學大獎的台灣作家劉克襄的《四分之三香港：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該書充滿香港「土地」本色，是否可納入認識台灣「土地」的文選範疇？

續出土的各國旅人曾留下貼近台灣「土地」的書寫內容也是台灣文學。而那些與殖民無關，「台灣民族」文學論述較難解釋的文學主題，皆可透過「土地無意識」進行分析，藉此評述作者藉創作所企圖呈現或解決的問題願望為何。

尾聲。土地的形成涉及繁雜成土成壤與生物活動，而文學亦如土地般總在歷史進程孕育而新生。隱含文學地質力量的「土地無意識」或能幫助透析文本土地意涵，進而開啟透過文學而將「土地」再政治化進程。面對現代性的大加速世界，文學、土地與作者間已不再僅存單一隸屬關係，而此種文學與土地的多重隸屬，有賴「土地」的再政治化方可更加釐清。本文作為一扇試探性研究視窗，尚有許多思慮未足之處；且礙於篇幅未能與更多理論進行對話，且採取偏向文學外部（extrinsic study）的綱領式論述方式，因而僅能列舉文本來嘗試說明「土地無意識」與視域形構。期待未來能再思選個別文本，深入詮釋台灣文學的土地意涵，進而探討「土地無意識」與文本間的更多關係。

四、裂解而生的新文化軀體：文本土地體系

「土地無意識」的定錨，若回到從鄉土到本土，再到民族主義的過程去看時⁵⁹，並不屬追求「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路線，而是期待能於「土地共同感」下，更加豐富土地語義並再產出新文化軀體的論述。不優先著眼於作者身份而改以文本中的土地做為視域界義，除了因為全球化下「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確已有其僵局外，更是希望能藉此跳脫某種殖民地慣有的反抗對立文化僵型⁶⁰。也正因此故，筆者嘗試將獨特台灣文化主體的物質性基礎再次歷史化而形成本文論述脈絡，並從脈絡拉回現實，期待藉此反射並連結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貌，盼能產出新文化軀體。

1990年代後台灣曾以「海洋」論述結合南島語系，而與中國大陸做區隔。其實海洋與土地的「水與土」僅是各佔不同比例的存在，「海洋」也可以是「土地」。而若將視線從土地移動至海平面底下潛探時，任何人都將發覺，原來在那幽邃海底，我們其實深深相連在一起。土地既可凝聚台灣，也可凝聚世上任何區域，「土地無意識」盼以文本出發而讓台灣與世界產生更多關係。

若有人問：「土地」的依據是什麼？面對網路時代，國家、民族或語言已不再是涵蓋最大、最具共同感之名詞。且因網路引發的人際關係快速熟悉，因跨族交流的血緣交媾血脈稀釋，民族國家、華語概念或將面臨挑戰。「土地無意識」的基本立場為「文本中心」，

⁵⁹ 參王國安，〈從「鄉土」到「本土」——彭瑞金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脈絡〉，《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46（2019.06），頁49-66。

⁶⁰ 「台灣民族」文學論述此處所謂跳脫反抗對立文化僵型的思考，來自李育霖〈帝國與殖民地的間隙：黃得時與島田謹二文學理論的對位閱讀〉，《「帝國」在台灣》（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12），頁278-282。

因此，「土地」依據請從「文本」出發，請對作家筆下進行物質性閱讀，並依此逐步建構如「土地無意識」的中國文學、香港文學、馬來文學、台灣文學、縣市文學、台灣原住民文學、「類異鄉」文學（如：越、菲、泰、印四方文學）……等，而成為「土地無意識」的「文土地體系」。此時，國家與地名將僅作為「文土地體系」的指認座標與詮釋標的⁶¹，文本的土地視域與詮釋才是中心。儘管作家各有其所屬國家之名，但作家所創文本，從來都更該屬於世界而非屬單一國家所有才是⁶²。最後，筆者認為，只要能讓「土地」自「文本」浮現，「土地無意識」的詮釋將自然找到其功能及必然性。由於期刊篇幅與說明策略之設定，以及「土地無意識」循《政治無意識》批判「傳統文學史論述」立場，本文並無意鋪敘「台灣文學史」或進行推導比較，以「界義與視域」論述主要用意僅在提舉某種文學研究可能性，並嘗試提出一種文本優先的文學範疇研究方向，共思「土地無意識」物質性歸類的文本意義。

⁶¹ 如：姜貴《旋風》將被視為土地無意識中國文學、張貴興《野豬渡河》為土地無意識馬來文學、劉克襄《四分之三之香港》為土地無意識香港文學，而佐藤春夫行腳台灣所留下的則為土地無意識台灣文學。而部分科幻文學的土地無意識，則當指跨越時空的未來土地。

⁶² 馬來作家黃錦樹教授談及「無國籍華文文學」時，訴求應讓文學從「民族國家」中被拯救出來的論述脈絡，也著實值得深思。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123-155。

主要參引文獻

一、中文

(一) 專書

-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台北，遠景出版，2003。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2007。
- 王德威、黃英哲著，《華麗島的冒險》，台北，麥田出版，2010。
- 許俊雅編，《王昶雄全集》，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2。
- 張恆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 王飛凌，《中華秩序》，台北，八旗文化，2018。
- 王尚義，《野鴿子的黃昏》，台北，水牛文化，2003。
- 巴代，《暗礁》，台北，聯合文學，2004。
-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文化，2000.2。
- 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台北，遠流出版，1996。
- 李喬，《寒夜》，台北，遠景出版，2001。
- 李喬，《荒村》，台北，遠景出版，2001。
- 李喬，《孤燈》，台北，遠景出版，2001。
- 李昂，《看得見的鬼》，台北，聯合文學，2004。
- 佐藤春夫，《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台灣》，台北，紅通通文化出版社，2016。
- 利格拉樂·阿（鳩），〈紅嘴巴的 VuVu〉，《紅嘴巴的 VuVu》，台中，晨星出版，1997。
- 林芳玫，《永遠在他方》，台北，開學文化，2017。
- 周金波，《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 陳大為、鍾怡雯編，《天下散文選 1970~2000》，台北，天下文化，2001.7。
- 吳明益主編，《台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文化，2003。
-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北，夏日出版社，20011。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1975。
- 吳晟，《農婦》，台北，洪範書店，1982。
- 吳宜蓉，《帝國制式的文化鏡映》，台北，花木蘭文化，2013。

- 東方白，《浪淘沙》，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
- 姜貴，《旋風》，台北，九歌出版，2016。
- 郁永河原著，楊蘇之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台北，圓神出版，2004。
- 涂妙沂，《烏鬼記》，台北，前衛出版社，2019。
-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1959。
- 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2010。
- 夏曼·藍波安等著，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2019。
- 陳芳明，《陳芳明文集4：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2008。
- 陳義芝主編，《散文教室》，台北，九歌出版，2006。
- 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散文卷》，台北，玉山社，2004。
- 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書店，2001。
- 陳映真，《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4〉》，台北，洪範書店，2001。
- 許立志，《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 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2000。
- 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散文卷（二）》，台北，九歌出版，2009。
- 張貴興，《野豬渡河》，台北，聯經出版，2018。
-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台北，東大圖書，1980。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
- 黃宗慧編，《台灣動物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2004。
-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1957。
- 鈴木伶子，《南風如歌》，台北，蔚藍文化，2014。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四卷·小說卷（一），台北，文化保存籌備處，1998。
- 楊青矗，《工廠人》，台北，水靈文創，2018。
- 楊千鶴，《花開時節》，台北，南天書局，2001。
- 楊双子，《花開時節》，台北，奇異果文創，2017。
-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
- 廖炳惠，《關鍵詞200》，台北，麥田出版，2003。
- 鄭德慶主編，《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
- 劉克襄，《四分之三의香港》，台北，遠流出版，2014。
-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1（小說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10。
-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2012。

鍾理和，《笠山農場》，台北，草根出版，1996。

鍾肇政，《沉淪》，台北，遠景出版，2005。

鍾肇政，《滄溟行》，台北，遠景出版，2005。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北，遠景出版，2005。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台北，遠景出版，1997。

蘇碩斌等著，《終戰那一天》，台北，衛城出版社，2017。

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René Wellek（韋勒克）、Austin Warren（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台北，五南圖書，2019。

Thomas Hobbes（霍布斯）著，朱敏章譯，《利維坦》，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

（二）專書論文

向陽，〈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零年代台灣話文學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頁 21-47。

李育霖，〈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闕境》，台北，書林出版，2009，頁 165-210。

李育霖，〈帝國與殖民地的間隙：黃得時與島田謹二文學理論的對位閱讀〉，《「帝國」在台灣》，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277-300。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頁 111-145。

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頁 259-299。

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國家認同學術研究會」會議論文《台灣文學探索》，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 57-78。

游勝冠，〈國家認同與九零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頁 477-504。

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 123-159。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集 1——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頁 4-5。

趙慎宇，〈青木繁的台灣山林隨筆〉，《觀念、分類與文類源流》，台北，秀威資訊，2016，頁 124-149。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57-78。

Walter Benjamin 著，陳永國、馬海良編，〈歷史哲學論綱〉，《本雅明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403-415。

（三）期刊論文

王國安，〈從「鄉土」到「本土」——彭瑞金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脈絡〉，《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46（2019.6），頁 49-66。

汪俊彥，〈另一種群眾想像：日治時期的劇場〉，《台灣文學學報》22（2013.06），頁 111-151。

宋澤萊，〈論吳晟散文的重大價值-日據時期以來台灣農村生活記實文學的巔峰〉，《台灣新文學》6（1996.12），頁 206-215。

林淑慧，〈台灣清治前期旅遊書寫的文化義蘊〉，《中國學術年刊》27（2005.03），頁 245-280。

林淑慧，〈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的人文關懷探析〉，《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6.3（2000.03），頁 77-91。

林芳玫，〈雅俗之分與象徵性權力鬥爭——由文學生產與消費結構的改變談知識份子的定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1994.03），頁 55-78。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11（2007.12），頁 21-49。

陳光興，〈去殖民的文化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96.01），頁 73-139。

梅家玲，〈性別 vs. 國家：五〇年代的台灣小說——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55（2001.11），頁 31-76。

張素貞著，〈五十年代小說管窺〉，《文訊月刊》9（1984.03），頁 83-109。

廖朝陽，〈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1995.03），頁 102-126。

廖朝陽，〈再談空白主體〉，《中外文學》23.12（1995.05），頁 105-109。

盧莉茹，〈風土自然與環境再現：十九世紀中葉兩位英美旅者筆下的打狗見聞〉，《高醫通識教育學報》11（2016.12），頁 101-125。

鍾肇政，〈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春秋》2.1（1989.10），頁 310-327。

（四）報刊、網路

范銘如，〈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中國時報》開卷版，2004.5.10。

《Pflaumenregen》的書訊來源：<https://www.perlentaucher.de/buch/stephan-thome/pflaumenregen.html> 瀏覽日期：2022.02.10。

內政部戶政司「主題資訊：人口政策及統計資料」，<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4>，
瀏覽日期：2022.02.10。

（五）其他

王瓊玲，〈文學批評與「理想的讀者」〉，《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8.3（2007.06），頁2。

張正，〈移民／移工文學，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文學館通訊》55（2017.06），
頁6-9。